试论中西文化的语言基础

褚孝泉
(复旦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中西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差异: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一个单一语言的基础之上的,而西方文化则是在一个多语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里的语言指的是精英文化语言而不是一般交际语言。由于汉语汉字和中国周边其他语言的差别历来与夷夏之别相关联,中国传统士人几乎从不留意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并不把异族语言作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这与西方文化传统正相反,掌握多种语言一直都是西方文化人的一个基本学识内容。近代以来懂外语成了新派学者区别于传统学者的一个特征,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范型转换。

关键词: 精英文化语言;单语;多语;夷夏之别

中图分类号: G 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8)03-0113-11

文者纹也,世上的文化都是缀绣在一定的语言底色上的华彩,不同的语言构成了文化的不同素底。如果我们分别观察一下西方文化和华夏文化所得以生长的语言背景,或许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之间重大差异的一些因缘。

我们可以先探索一下在所谓的轴心时代期间中西两边的语言情况。最近几十年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时代,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古代简帛文献的出土,目前还在释读中的这些简册,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战国秦汉时古人读的书的原貌。这些佚失了两千多年的典籍提供了古代思想的珍贵资料,可以据以改写中国古代思想史,然而这些文本包含的语言信息也很值得我们注意。至今出土的所有这些简帛文献,都是用同一种语言写成。[①]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研究者来说,这毫不奇怪,或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西方的情况,就会发现这其实是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20 世纪中叶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出土文献发现。最著名要算是在约旦河谷发现的死海古卷和在埃及沙漠中发现的俄克喜林库斯纸草文卷。死海古卷的书写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和中国发现的简帛的制作时间大致相当。死海古卷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与希伯来圣经有关,使用的语言文字有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等。俄克喜林库斯纸草文卷跨越的时间段更长,从公元前三世纪一直到公元后七世纪,其内容也颇为庞杂,除了典籍片段还有法令、书信、税赋记录、契约等,这些纸草纸文卷至今还在拼接释读过程中,学者们在这些古卷中已经读到了希腊语、埃及语(包括用古象形文字,通俗文和科普特文书写成的)、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古叙利亚语和巴拉维语等写成的文本。更往上溯,更往中心地带去,我们发现的还是类似的繁复的语言状况。不仅在纪元前后几个世纪中在中东这个列国势力犬牙交错的边缘地区里所发现的古卷中我们读到有多种语言写成的文本,在历史的更深处,在上古大帝国的中心,也同样地流行多种语言。公元前 16 至 13 世纪兴盛的赫梯帝国显然就是建立在一个并行使用多个语种的文化环境中的。20 世纪在土耳其安卡拉以西地区发掘出来的赫梯帝国的王家图书馆里,我们读到了赫梯语、阿卡德语、胡利安语、卢维语和巴莱语的文本。而对比来看,与此在时间和地位相近的中国商周时代的甲骨文文献却都是以上古汉

收稿日期: 2018-01-06

作者简介: 褚孝泉,上海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① 横田恭三:《中国古代简牍综览》,张建平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版,第 6—9 页。

语这单一语言写成。在西方文明起源地区发现的这些古文卷中出现了这么多种语言文字,这并不令学者惊奇,因为中东地区一直是个种族杂居的地区,文本中出现多语现象很自然。需要解释的是中国出土的古文本中的语言单一现象,目前我们看到的战国简大都出土自楚国,先秦时代荆楚地区不属于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区,其在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地位,恰于纪元前后中东地区在西方文化圈里的空间地位相仿佛。目前发现的汉简涉及的空间范围更加广大,从甘肃武威到江苏仪征,从内蒙古额齐纳汉边塞到广西贵县,纵横数千里都有汉简出土。时间上的间距更是令人瞩目。战国楚简目前一般被认定为写成于纪元前四世纪左右,许多汉简的写作年代要晚至西汉末年,三国吴简则晚至东汉末年。这些简册的年代前后跨越五六百年,然而,除了文字形体上有从战国文字到秦统一的小篆到汉隶的变化,就语言本体来说,书写在这些简册上的语言非常恒定和一致,从词汇到句法都确切地属于同一种语言。我们知道,人类语言在空间的扩散和在时间的延续过程中必定会发生变异,导致方言和新的语言的产生,这是历史语言学揭示的规律,没有理由认为汉语能够是个例外。古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礼记·王制》说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颜之推指出,“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音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较明之初也”。① 比如战国时楚人的语言显然和中原地区的语言相当不同,扬雄的《方言》记录了他观察到的汉语地方方言的词语差异。除了汉语的方言,当时中国大地上也还有许多非汉语的语言存在,在秦晋燕赵的境内境外都生活着被称为夷狄的族群,他们说的语言当然不是汉语。然而,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当时书写成的典籍文书中没有多语的迹象。西方文明摇篮时期的多语文状态,在华夏文明的同时期并不存在,我们有的是一种稳固的单语文化氛围。可以说西方文明是绣在一个杂色的语文底版上的,而华夏文明则是演绎在单色的基底上的。

中国的古文书所显示的这种单语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个技术性的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文字的影响。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技术发明,而汉字的发明则对华夏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汉字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和汉语的紧密关联,可以说汉字是专为汉语设计的,难以转用于书写其他语言。而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西方文字体系,在作了些调整后就可以适用于书写不同的语言。苏美尔人在纪元前三千年发明的楔形文字很快就被借用来书写阿卡德语、伊兰语、赫梯语等许多种中东地区的早期语言,尽管这些语言互相差别非常大,属于不同的语族。纪元前十世纪后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更可以被灵活地用来书写许多不同的语言,例如希腊语;而罗马人改造后的拉丁字母后来被广泛用来书写世界上大多数的语言。汉字并不具备这种书写的通用性,作为一种书写体系,汉字和汉语之间更有一种特别紧密的契合。汉字早期被用来书写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然后在我们的这些邻国里,汉字终究被更适合那里的语言的假名,谚文和罗马字母所取代了(日语里当用汉字被限定了数量,并且常常要用假名来注音)。汉字也曾被用来记录蒙古语的《蒙古秘史》,这部书的释读之难,也表明了汉字作为一种文字系统,与其他语系的语言很不相配。可以设想,在先秦汉魏时代,即便中国周边和内陆有许许多多使用非汉语语言的族群,他们的文化创造很难用汉字摹写下来。蒙古文藏文满文等都是相当晚期的发明了,因此在我们看到的简帛上没有汉语以外的语言痕迹。

不过,汉字的特点这个技术性条件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华夏文明的单语性。毕竟,需要是发明之母,如果汉语以外的语言在中国文化体系里有其地位,合适的书写方式应该会被发明出来的。事实上也确实有这样的发明,如契丹文和西夏文。但是这些异族古文字都慢慢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传承到今天的华夏文化遗产几无例外都是以汉字写成。这令人设想,非汉族语言在中国早期文明的文本中的缺席自有其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社群事实上都是生活在多语种的环境中的。社会语言学家们早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第十八”,《诸子集成》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40 页。

就观察到,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总有不同的语言起着不同的作用并被赋予不同的地位。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弗格森(Ferguson)曾经定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双层语言(diglossia)",指的是人们会在上层社会生活中和下层社会生活中使用两种不同的方言或语言。显然在许多社会里都存在这种双层语言现象①,例如在当代中国,大多数人会在工作单位或其他正式场合说普通话,而在家里或休闲的场合说自己的家乡方言,普通话就是上层语言,方言就是下层语言。在印度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里,人们会根据交际对象的不同而转换使用自己的本族语言和地区或国家的通用语,乡村里使用的族群语言就是下层语言而地区或国家的通用语就是上层语言。然而,这个"双层语言"的概念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语言差异现象,我们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观察到的语言分布状况与弗格森的"双层语言"结构似相近但又很不一样。"双层语言"指向的是社会中的一般语言交际方式,特别是口语交际方式,而我们想说明的是文化特别是精英文化创造和传承中的语言使用状况。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都属于建立在文字记载上的书面文明,因此我们需要区分的不是口语中的上层语言和下层语言,而是能够以书面形式保存的语言和一般交际语言。前者可以被称为精英文化语言,后者则是即时交流用语。用来写成表达核心思想的典籍,宗教圣书、诏书法令、历史文献、外交文书、诗赋文章等是精英文化语言;而面对面的言说使用的是一般交流语言,除了偶然被史家用书面语记录下来,随风而逝不留痕迹。当我们说华夏文化具有独特的单语特点,我们并不是说在中华大地上只有一种语言存在,华夏大地上一直有众多语言,这和西方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除了汉语,没有其他语言被提升到精英文化语言的地位,而在西方传统里一直有多种语言上升到精英文化语言的地位。因此,传统华夏文明的社会语言交替的地位起落不是表现在不同的口头话语的使用上的,而是以书面文化语和日常口语的界限来划分的。中华文明的书面文化语言以汉字为唯一载体,这种书面文化语言在先秦时期形成并固定后,被使用于中华文明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举凡政治、外交、文学、思想等精英文化领域里的交流,都使用这种统一的书面文化语。汉文之文,在中国文明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因此也被赋予了至高的象征意义,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②,"文"不仅构作成今天所说的文学创作,还是整个社会国家得以形成的织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③。汉语中"文"这个词的含义很快从指书面文字扩大到指称国家的整个统治意识和制度,甚至超越经验而关涉大道之行,"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④。"文"所具有的这个崇高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书面语言在中国文明中所起的至上作用密切相关的。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古代文化遗存,毫无例外地都是使用这种唯一的书面文化语写成;相反,在口头交际时,即使是在庙堂之上,使用方言或带着浓重方言口音说话并不有损于说话者的地位声望。《世说新语》记载的一个轶事颇能表明社会精英对方言的态度,刘惔去见丞相王导,"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⑤。刘惔语带讥讽,并不是因为王导说了方言,而是由于南渡的北方士族不喜南方吴语。陈寅恪以为,"永嘉南渡之士族,其北方原籍虽各有不同,然大抵操洛阳近傍之方言,似无疑义""东

---

① 'Diglossia', Ferguson, *Word*, 15, pp. 325 – 40, reprinted in Dell Hymes ed.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s and Row, pp. 429 – 39,

② 曹丕:《典论》,高步瀛选注:《魏晋文举要》,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6 页。

③ 王安石:《上人书》,《全宋文》第 64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67 页。

④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原道第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2 页。

⑤ 余嘉锡著,周祖谟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684 页。

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接庶人则用吴语”①。据此,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文明中的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高低之分不在于口语方言的差异上,而主要在书面文化语言和一般交际语言之间。上古华夏文明世界范围里没有汉语以外的其他书面文化语言存在,由于汉语书面文化语言构成了唯一的上层社会文化空间,这导致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语言文化特征,那就是非常恒定而单一的书面语成了社会精英唯一使用和关注的文化载体,而几乎不理会世上还有什么其他语言。北齐人颜之推很明白地阐述了汉语这种书面文化语言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所在:“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偏于经史”“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②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发这番议论的背景是异族语言盛行的北胡地区,权势人物大都以非汉族语言为母语,然而,即便那里的王公贵族都操胡语,士人们只有精通经典的汉文,才不致沦为小人。士族精英从不觉得异族语言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价值,汉唐以来,尽管和中原地区有交往的边地民族使用的语言种类并不少,却并没有第二位扬雄来描写和记录各地的种种夷语胡话。

中华文明的这种单一语言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面貌。每种文化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载该文化的阶层所受的教育的内容;接受什么样的教养便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和精神上的准备,后继创造出的文化产品就会有什么样的特质。因此,对任何文化来说,在其历史中形成的教育体系会对该文化的发展前景规定方向和限定范围,而所有的教育体系都是无例外地围绕着该文化的精英语言而发展起来的。如果要比较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异,这两种文明传统中的不同教育要求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而其对文化继承者的语言素养的不同要求和规定,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题目。

多语教育在西方文化的人文教育体系中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是否懂得和掌握多个语言,一直是西方社会衡量一个人的教养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古罗马,无论是共和国时代还是帝国时代,罗马贵族子弟从小就必须学习希腊语。纪元一世纪时,昆体良在他的《雄辩术原理》中建议,每个罗马孩子应该先学讲希腊语,应该学习希腊文法,再学讲拉丁语,他同时指出,罗马人实际上也就是在这样做的。③ 许多罗马贵族家庭都直接从希腊找来希腊老师教授他们的孩子讲读希腊语,结果罗马有了一大批娴熟于两种语言的贵族人士,被称为“双舌人(utraque lingua)”。基督教在罗马世界的兴起并没有改变这种双语的文化要求。纪元四世纪时,有个虔诚的罗马妇女为她女儿的教育征求圣哲罗姆的意见,圣哲罗姆回复说,“让她背熟很多希腊文的诗句,也要教给她拉丁文”。④ 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后,西方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有名的七艺,加洛林时代确定的前三艺是七艺的基础,即为语法、修辞和雄辩术,教的就是拉丁文的语法和修辞,都是有关语言学习的,而对中世纪的文人学士特别是地中海地区以北的日耳曼蛮族后裔来说,拉丁语就是一种外语。整个中世纪的文人学士全是从学习掌握拉丁文开始他们的学业的。懂得读写拉丁文一直都是学识教养的主要内容,而希腊文知识则是更高学养的标志。在查理曼大帝倡导的欧洲第一次文艺复兴时期,蛮族的贵族开始专心学习遗忘已久的古典语言。查理曼大帝请到他的宫廷里来的大学者阿尔昆(Alcuin)给皇帝陛下的群臣各取一个希伯来语或希腊语的名字,以给这些日耳曼贵族一点高等教养的色彩。从那时起一直到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懂得这几种古典语言成了衡量人的修养的标准。超群绝伦的全

① 余嘉锡著,周祖谟整理:《世说新语笺疏》,第 687 页。

② 《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诸子集成》第八册,第 13 页。

③ Quintilian, Institutio Oratoria, Book 1.1, Loeb Classical Library, p. 71.

④ Letter CVII to Late, Saint Jerome, http://www.umilta.net/jerome.htm

才如达·芬奇，还被佛罗伦萨的上流社会视为是个学力不够的匠人，理由就是他的希腊文拉丁文不够好。① 确实，达·芬奇只是自学了一点拉丁文，在他留下的那些著名的笔记中，还有他做的拉丁文动词变位练习，他对希腊文则几乎完全不懂。一个世纪后的莎士比亚也面临同样的批评，本·强生在那篇著名的对开本题诗中慨叹他只懂“一丁点拉丁文，更少的希腊文（little Latin，less Greek）”。这个揭露，后来成了许多人要否定这位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著作权的重要证据之一，他们不相信一个外文不好的人能够写出这些辉煌的文学经典来。到了宗教改革期间，掌握多门古典语言不只是个文人和艺术家的学识教养问题，马丁·路德认为，懂不懂这些语言直接关联到信仰的坚定和纯洁，在路德的《告德国各市长和地方长官书》中，他写道，“如果我们从这些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没有得到其他什么好处，仅仅把这些语言看成是神授予我们崇高而又光荣的礼物，我说，这一仅有的想法就应该是修习这些语言的强大动力和吸引力……因为撒旦清楚地知道，在这些语言繁荣兴起的地方，他的权力很快就会土崩瓦解，不易修复”②。近代以来，拉丁文和希腊文慢慢淡出，但外文还是西方教育的中心性目标。哲学家洛克同时还是位教育思想家，提出了理性的教育理念，他在《教育漫话》中告诉他的英国同胞，“一到他（孩子）能说英语的时候，他就应该学习别种语言。如果建议儿童学习的是法语，那是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疑虑的”③。这和两千多年前昆体良要求他的罗马同胞在学习母语拉丁语的同时一定也要学习希腊语的教育理念一模一样。这个重视多种语言能力的教育思想在西方一以贯之，并且在中世纪以来的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实现，十六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波尔多市决定设立一所第一流的学校，聘来的教育家维内校长为学校制定了一个教学纲要，这个纲要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欧洲教育内容：六岁或七岁的孩子入学上十年级，九年级时就要求他们能用法文和拉丁文流畅而快速地阅读和书写；升到四年级时开始学习希腊文一直到毕业。欧洲其他地区的学校提供的教学课目中都有大体相同的语言必修课④。十七世纪时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建立起来的哈佛学院的校规和课程设置中表现出了同样的对多语能力的重视，入学哈佛的条件是能即席读懂西塞罗的作品或同类的古典拉丁文作家的作品，以及按希腊文的名词和动词变化表正确地变格。入学后，四年级的学生每周四学习希腊文，三年级的学生每周五学习希伯来语和东方语言。当时的东方语言指的是中东地区的语言，如迦勒底语和叙利亚语⑤。由于西方文明里的这个重视外文教育的传统，不仅历来的学者都是通多种语文，一般上流社会人士差不多都能运用两种以上的语言，统治了大半个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皇帝能娴熟地说五六种语言。多语能力，当然是我们定义的多种书面文化语言的能力，一直是西方社会上层精英的基本素养。

反观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传统。从周秦时代起，几乎从来没有哪个文人学士词臣权贵因为不擅外文而遭受轻视，在经典的学识素养中，从没有外文这个因素，汉语以外的语言，从不在中国学人的视野之内，无论是先秦贵族须掌握的“礼、乐、射、御、书、数”这样的技能性的“六艺”，还是孔子教授儒家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的“六艺”，都没有汉语以外的语言的课程。汉代的太学以儒学九经为教学内容，以后各朝代从国子监到书院到乡学，其教育内容基本不出儒家经典的范围，只有在教授的经典书目上根据科举的要求而有所增减，但是从没有使用汉语以外的语言的教育内容。当然，中

①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by Bronowski and Mazlish, Dorset Press, 1960, p. 11.

② E. P. 克伯雷选编：《西方教育经典文献》，任仲印译，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92 页。

③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Harvard Classics, Vol. 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06, p. 120。

④ E. P. 克伯雷选编：《西方教育经典文献》，任仲印译，第 252—255 页。

⑤ E. P. 克伯雷选编：《西方教育经典文献》，任仲印译，第 350—352 页。

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教授外族语言文字的学校,蒙古族统治的元朝设立有教授蒙古文典籍的蒙古国子监和教授“亦斯替非文”即波斯文的回回国子监,明朝设立有教授周边国家语言的“四夷馆”,清朝设立有为满族子弟开办的旗学①,但是因为作为核心文化制度的科举里没有考察外语的科目,元朝以后出现的这些教授异族语文的学校并没有冲击中国文化的单语文化基础,对海内文人士子文化素质的养成并无影响。华夏文化教养中异族语言的缺席,其原因并不是汉语的中华文明没有和其他语言发生过接触。毋庸置疑,像世界上任何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在一个单纯的语言环境中衍生演进的,由于在中国的周边和内部一直有着各种不同的汉语以外的语言,汉王朝的统治者同样地有与使用其他语言的族群交流的需要。然而,与这些语言交际的能力被看作是一种低级的技能,士族阶层并不觉得这些外族的语言能作为精英阶层的学养的一部分。在《周礼》的等级制度中,“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孙诒让注曰,“是此官通番国之辞,故以主宾之辞传译通之也”②。也就是说,掌握他族语言是那些专门的胥吏的事,并不是贵族教养的一部分。汉晋以降,周边许多民族都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20 世纪以来面世的西域古卷,特别是敦煌石室里发现的古文本,表明当时在中国的西边流行着相当多的语种文字。不管当时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把这些文书封存在敦煌的这个密室中的,这些于阗文、古藏文、粟特文、西夏文、回鹘文、古突厥文、梵文和希伯来文的文书被收集在一起保存在同一个地方,清楚地表明当时那个地区在语言使用上的繁复多样的状态,无论是意义范畴,使用者群体还是流通地域,这些语言之间并不是分割断裂的,这说明当时汉人懂外族语文应是常态。其实,不仅在古丝路的西域有多种语言的流行,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汉族士人中也一直有通异族语言的人。这是因为无论和战,汉族朝廷一直和四周的民族有着密切来往,自然会有互相习得对方语言的。《世说新语》中有个著名故事,“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因过胡人前弹指曰,‘兰阇,兰阇!’群胡同笑”③。这是王导在运用他的外语能力为立足未稳的东晋政权争取人心。“兰阇”,王应麟认为就是梵文的“兰若”,意为静心。除了在交际场合有用胡语的,更有诗文中掺入外文的。也是东晋时,“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公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④郝隆是职守所在而会蛮语,而北宋名臣余靖也在出使契丹时学得契丹语,并同样以外语入诗:“余襄公靖尝在契丹作胡语诗云,‘夜筵没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幹勒,微臣雅鲁祝君统,圣寿铁摆俱可忒。’没逻言后盛,拜洗言受赐,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铁摆言嵩高也。”⑤余靖以契丹语入诗,和王导一样,是对外族人的一个亲善姿态,实际上汉族士人并不把异族语文当作自己文化修养的一部分,桓玄的反应正是表达了这种态度:“作诗何以作蛮语。”在汉文史籍中,将周边的语言都概而名之:胡语,夷语,蛮语,从不留意区分其中的差异。今人读到史载某人“通胡语”,我们并不能知道他懂的是粟特语还是突厥语。中国古代史家对异族语言的含混命名,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吕氏春秋》有云“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高诱注曰:“戎狄言语与中国相反,因谓反舌,一说南方有反舌国,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⑥对异族语言如此偏见,当然不会引起汉族的学士文人对汉语以外的语言文字的兴趣,也

① 郭齐家:《中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8—410 页。
②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3687—3688 页。
③ 《世说新语笺疏》,第 154 页。
④ 《世说新语笺疏》,第 696—697 页。
⑤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十二编,台北:新兴书局 1987 年版,第 639 页。
⑥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三册,成都:巴蜀书社 2002 年版,第 239 页。

不会视其为文化语言。东晋北宋的名相重臣学会胡语,完全是出于对付外族的政治需要。当然,在胡汉混杂异族崛起的南北朝时期,懂得外族语言还是会被看作是官吏们的一项很有用的能力。比如在北齐时,会国族语言以外的“四夷语”是被当作一个值得赞扬的长处,“代人刘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情性甚整,周慎谨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①“(祖)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②。不仅在汉胡杂处的北朝时期朝廷要任用懂夷语的官员,承平的东汉时镇守南方边陲的官员也觉得懂点异族语言不无益处,“(益州刺史梁国朱)辅上疏曰,……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椽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语,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③。然而,这样的外语能力只属于“文章之外”的偏才薄技,在正统文士看来,虽然比起平原君的食客们的鸡鸣狗盗之术要高出不少,但也相差不远。即便在盛行多种语言的北齐,虽然权贵们多说胡语,汉族士人还是觉得只有汉语才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颜氏家训》里的那个著名故事把这个北胡地区里的语言等级表达得非常清楚:“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自致卿相,亦不欲汝曹为之。”④尽管鲜卑语是当朝者的语言,很能学以致用,但汉族士子还是认为这种权贵们所通用的语言并不能成为士人阶层学识教养的一部分,与他们的文化身份无关。这段议论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实用的语言技能和精英文化语言并不具有同等的社会价值的。而且,当汉字构成的精英文化语言等同于华夏文明本身,则汉语与胡语之间的界限就被赋予夷夏之别的重大政治内涵,说胡语还是说汉语会成为关联到政制本体性质的严重问题。北魏孝文帝政治改革的一个大举措就是:“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⑤也就是说,禁止鲜卑贵族在朝廷上说自己的母语,以去夷入夏。孝文帝很明白,在中国环境里只有汉语汉文才是精英文化语言,因此而有改行汉语汉字的必要性。孝文帝要为自己和他的王朝建立的文化身份同时也是他个人的文化选择,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⑥。他所读所讲的五经百家当然都是汉语的典籍。很显然,选择汉语禁绝胡语,并不只是个便利的考虑。事关夷夏之别,孝文帝的语言政策招致后人纷纷议论。千年之后的王夫之对其持非常严厉地批评态度,因其时代遭际,他将严守夷夏之别看成是儒家的生命底线,“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⑦。胡人孝文帝施行的包括改胡语胡服等的汉化措施,有违于“绝夷于夏”,所以王夫之严词斥责,他认为“涂饰耳目,是为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视宏之所为,沐猴而冠,优俳之戏而已矣,……则亦索虏欺人之术也”⑧。王夫之如此议论,或许想到的是明初太祖登基伊始就发布的禁胡语胡服的诏令⑨,朱元璋不准汉人习用胡语,为的是重建了汉家文化身份,以语言区别体现夷夏分野,而明清换代之际的北虏满人贵族们大都熟习汉文,颇有抹杀夷夏界限的气象,王夫之专以一个“伪”字来斥责改行汉文的孝文帝拓跋宏,或许是意指当朝。

---

① 《北齐书》“列传第十二”,卷 20,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267 页。
② 《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一”,卷 39,第 516 页。
③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2855 页。
④ 《颜氏家训》“教子第二”, 第 2 页。
⑤ 魏收:《魏书》卷七下,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20 页。
⑥ 魏收:《魏书》卷七下,第 126 页。
⑦ 王夫之:《船山遗书》,第 317 页。
⑧ 王夫之:《船山遗书》,第 372 页。
⑨ 谈迁:《国榷》卷三,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57 页。

深切于亡国之痛的王夫之将汉胡语言之别看作是分明夷夏的标识,这很能代表汉族士人的正统观念。在这个语言意识背景下,我们能理解为何传统士人对学习异族语言那么没兴趣无动力,反观西方,精英文化并不总是限于一种语言内,因此很少有以国家权力禁用外族语言的例子,而精英阶层一直以多识外语为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有着多种精英文化语言,语言之别从来不是文明和野蛮的分界。在华夏文明范围里,外族语言至多只是一种实用技能,而且一旦与夷夏对立相关,夷狄胡语就包含了危险。通晓胡语的技能在国势强盛时固然可为朝廷所用,在面临异族势力进逼时,这样的技能则会被认为是种威胁,帝王们颇不喜臣下通夷语。安禄山能动摇大唐的天下,其手段之一,竟是因为他这个胡人懂外语:"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①到了大清,面临前所未见的来自西方的夷人,乾隆皇帝颇感忧虑,为了防范,他将通夷语本身看成了一种需要防范的罪行。乾隆五十八年,他对上报的"浙江人郭姓从前曾勾结夷商,今已病故,伊子郭杰观略省夷语。已经严加管住一节",下旨说,"郭姓曾有勾结夷商之事,伊子又能略通夷语,虽现无勾串情弊,然此人留于浙江究不可信,着即派妥员伴送由别路进京备询"②。并没有犯任何法规的一个浙江人,就因为懂夷语,被皇帝下令看管起来,并递解进京。道光皇帝时西夷更加咄咄逼人,他对懂夷语的人的处理也就更加峻急,下旨曰:"查广东洋行司事谢五即谢治安,为人奸猾,熟习夷语,素与该国夷商交结。前月夷人乘坐肩舆即谢五送给,现拏获收禁,饬该府县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③当与夷人发生争议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查出谁能和夷人通话:"至该逆所称定海开行之船先往镇江南京后到天津等语,系向何人说及? 内地民人又何以能通晓夷语? 均着向宝山县确切询明,附便具奏。"④百姓通夷语是皇帝要严查的大问题,让臣民学习夷族的语言显然不是他所能容忍的事。

当然,清朝中后期官家对夷人语言的警惕显示的是这个朝廷面对西洋的不自信,这并不表示中国朝廷上下在历史上始终是排斥或蔑视外族语言的。曾经有一个时代,中国对外族语言持着开放容忍的态度,甚至还热切地学习,有一种语言似有成为华夏第二种精英文化语言的机会,那就是在大唐时期印度的梵文在中国佛教徒中的流行。大唐高僧们为学习梵文花的功夫,几乎不亚于古罗马贵族对希腊语的那种热心追求。玄奘是如此赞颂经书的梵文:"书称天书,语为天语;文辞婉密,音韵循环;或一言贯多义,或一义综多言;声有抑扬,调裁清浊。"⑤这样的评价,与传统的"反舌"成见,相差何止千里。玄奘自己精通梵文,能在印度授课辩论著书,回国后译经千百卷,其对梵文的娴熟,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然而,玄奘并不是个孤例,在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的那些唐朝僧人,都以学习掌握梵文为弘法事业的基本条件。如他讲述的"沙门玄照法师者,……,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⑥,表明当时在中国国内已有成熟的梵文教学,当然只限于迦蓝寺院。义净著录的那些高僧行状中,都有学习梵文的经历,或者是在中国,或者是在海外,然后再到印度完成他们的求法事业。可以说在那个时期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学人,他们认可了一种和汉语一样高雅的语文,并尽力地去学习它,这在中国语言文化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这也是后无来者的,至少直到现代。可与印度佛教文明在华夏的传播相比拟的,是千年后基督教文明在明末传入中国的历程。同样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明,同样是借助了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同样是由非常杰出的博学人士传入的,同样为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学人所接受,但是结果颇

①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五,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6417 页。
② 《清实录》第 27 册,高宗纯皇帝实录(19),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上。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8220 页。
③ 《清实录》第 35 册, 宣宗成皇帝实录(3),道光十年十一月下,第 37552 页。
④ 《清实录》第 38 册,宣宗成皇帝实录(6),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上,第 40911 页。
⑤ 释玄奘:《宋思溪藏本大唐西域记》第三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2 页。
⑥ 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9 页。

为不同。拉丁语未必比梵文更难学,徐光启在才智上肯定不会比唐朝的那些僧人低,他对基督教义以及相关的西方文化的热忱也不可低估,然而他竟没有觉得有学习拉丁语的必要。他对西学的了解,全仰仗利玛窦等人的译作。在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时,也是请利玛窦"口传,自以笔受焉,反覆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①。不仅徐光启没有学习拉丁语,明末清初的那批和西方传教士密切来往的中国士子,不管是皈依基督教的还是只对西方学术感兴趣的,都没有像晋唐时的和尚那样努力学习载有新知的外来语文。理由当然有许多,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都已学好了汉语文,先替他们的中国对话者做好了语文转换工作,让人觉得学习拉丁文的功夫似乎是可以省去的。唐时流行中国的佛教教义芜杂混乱,来华番僧良莠不齐,这促使玄奘等人决心去佛教的源头寻找真经;而传来基督教的利先生连李贽都觉得是个"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②,他所言所书,当可令人完全信服,不必要到拉丁文的原著里辨出个是非。这些我们能想到的理由都存在。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可探究。宋元以后,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更趋固化,哲思心灵那层通过吸收佛学禅理也已补上,严密稳定的科举制度使得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文本占据了中国士子的全部思想,他们不觉得有越过语言界限去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世界的需要。中国文化的单语性在这个时代已经达到非常稳固的程度了。

当我们阐述中国文化的单语性并与西方文化的多语性比较时,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两种文化并不是在语言构成方面一直是保持着相反的特性的。正如前文所显示的,在晋唐时期,通过那些无畏的求法高僧,中国精英文化中曾经有过多语的因素,尽管只限于在寺院的世界之中,也没有得到继承。在西方,我们同样能看到一个具有相当单语性的时代。在漫长的中世纪,拉丁文成了整个欧洲唯一的精神活动的载体,主要由修道院以及稍后的大学维持和发展的中世纪的精英文化完全围绕着拉丁文的文本在流布。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欧洲中世纪的学者靠着拉丁文可以毫无障碍地互相交流,意大利学者撰写的神学论文,瑞典的教士们读来毫无困难。尽管他们各自的母语非常不同。西方中世纪流传至今的文献基本上都是拉丁文的,这和中国的文言起的作用颇为相似。在这个单一拉丁语的基础上,欧洲保持了近千年的思想上文化上和制度上的统一和稳定。这种令人安心的单语状态从十三世纪开始就发生了分化。十四世纪初,但丁撰写了《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他论述了欧洲各地语言的分布情况,赋予意大利方言以文学语言的地位。这部未完成的论著预示了即将到来的西方语言巨大变化。但丁自己身体力行,开始以意大利文创作。意大利语、英语、德语、法语等原来只是地方方言的语言很快就进入了精英文化的殿堂,官方文书、高雅诗文、哲学讨论,都开始使用各种近代欧洲语言来写作。印刷术的发明更加快了这个向多语演变的进程。1461 年,第一本德语书籍出版;1462 年,第一本捷克语书籍出版;1471 年,第一本意大利语书籍出版;1474 年,第一本英语书籍出版;1474 年,第一本加泰罗尼亚语书籍出版;约 1476 年,第一本法语书籍出版;1477 年,第一本佛兰德语书籍出版;1483 年,第一本克罗地亚语书籍出版。③ 欧洲的语言地图爆发式地进入了多语时代,欧洲文化也在这个时候爆发式地进入了一个伟大创新的时代,那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值得关注的历史变化,做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学者喜欢讲"大分流",在我看来,中西文化的真正大分流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这样的巨大思想文化运动,其起源当然不是任何单一的原因所能解释的,中世纪晚期西方社会里酝酿涌动已久的各种动因风云际会,引发出了这场伟大的社会文化革新创造运动来。或许我们还难以证明是精英文化语言的多元

① 梁家勉原编,李天纲增补:《增补徐光启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2 页。

② 《续焚书》,转引自《增补徐光启年谱》,第 120 页。

③ 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李霄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 页。

化拓展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地平线,还是中世纪思维的蜕变给各地的方言打开了发展的途径,何为因何为果并不容易确定,或许是互为因果的。所能确定的是这两个演进是同时发生的。在那几个世纪里,那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越出了单一的拉丁文,先是以古典希腊文,随后以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等新兴的文化语言思考创作和表达,在崭新的语言素料上织出了绚丽多彩的新文化,从而在根本上改塑了西方文化的面貌。然而,在西方已经重建了他们文化的多语化以后,当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对汉语文言以外的语言文字完全失去了兴趣,没人觉得有必要去学习利玛窦他们带来的那些泰西新知的原文。如果说那时还有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个陌生的文字感兴趣的话,也是因为拉丁字母能够被用来很方便地标示汉语的音韵结构。①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西开始发生冲撞。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不仅打破了中国的海防国门,对整个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体系都造成了巨大的震荡,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后果是华夏文化的单语壁垒开始出现裂纹。张之洞算是位较温和的改革人士,在他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他的教育改革规划,其中有:“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②此时已近十九世纪末,离 1818 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英华书院”教授华人英语,已经过了八十年,从华夏文明圈的边缘开始的外语教育,经过像郑观应这样的维新人物在《盛世危言》中的呼吁,终于为中土的精英人士普遍接受,主政的权臣在培养新的正统士人的计划中,破天荒地列入外国语文,这时汉语以外的外族语言已经被认为是未来士人应该具备的知识素养了。当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归国后开始执中国学界文坛的牛耳时,实际上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相当根本性的范式转换。他们被称为新派学者,不仅是因为他们思想理念学术方法新,他们的学识背景与前人完全不同,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学术视野是多语的,他们的学术世界里的精英文化语言是多元的,这是千百年来都没有过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范式转换。陈寅恪被认为是守旧的,自许为“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但他具备常为人羡称的相当广阔的语言背景,这是曾张所没有的。他晚年专研钱谦益,表白其动机说:“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前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③然而陈寅恪懂梵文及其他多种相关语言,钱牧斋所学再精深,也没有外国语文,陈寅恪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范型里和钱谦益对话的。同样地,陈寅恪为清华入学考试所出的对对子题目,看似非常传统,好像村塾业师亦可为之,然而他对此举的思考如没有多种文化语言的背景则绝无可能。整体而言,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中国学人所具备或被期望具备的语言能力从单一的汉语文言文扩展到英法德日多种语言,这个变化,与西方中世纪晚年欧洲学者的学术语言一下子从单一的拉丁文扩展到多种近代语言的变化庶几相近,这个变化给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巨大变革也是类似的,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文化依存于文化人,文化人的语言素养构成对文化的内涵和形态的演进到底是怎样产生影响的呢? 换言之,建立在单一语言基础上的文化和生长在多种语言环境里的文化会各有什么不同的特质呢? 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确切回答的问题,更难以下孰优孰劣的判断。若不揣浅陋试加辨识,则可说华夏文化与汉字几乎熔铸为一体,这给华夏文化带来一种非常恒定而纯一的面貌。自先秦至清末,华夏文化的承载者和实践者感受的是他们始终被笼罩在同一个文化的氛围之中,不管是儒法墨,还是儒道佛,他们共有的是同一个文化身份,都是“化内”之人,这个“化”,即是由汉语汉字明确划定的,由此而与“夷”区别。反观西方文化,其语言的多元性使得文化身份的认定具有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编,第十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59—671 页。
② 张之洞:《初学篇·设学第三》,清末民初文献丛刊,北京:朝花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6 页。
③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 1 册,北京: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 页。

相当的流动性,从希腊拉丁文到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蓬勃兴起的各种近现代语言,西方文化人很少有拒斥某种外族语言文字以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反应,也很少执念于语言 - 族裔 - 文化 - 信仰这个连续线上。从另一角度来看,出入于各种不同语言的西方文化人拥有更加多样的语言观念资源,他们的思辨话语一直在吸收着来自不同语言的辞语概念,从来自希腊语的 eidos, nous, logos 到来自法语的 élan vital, differance 到来自德语 Ding an sich, Dasein, 等,多样化的语言源头一直在输入多样化的概念指陈;而在华夏文化的传统中,只有汉唐之际西来佛教给汉语的思辨话语增加了来自梵文的“般若”“涅槃”“禅”等外来新辞,而且这些佛家语在华夏文化中还是比较边缘化,进不了科举卷题的正统话语中。两千多年以来,士人们的思辨始终是围绕着来自于上古汉语的那些基本概念来进行:“道”“仁”“治”“礼”等。从先秦诸子的论辩到明清大儒的心学实学,就是一场几乎从没有中断的对话,今天读来,毫无隔绝之感。这是纯一语言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令人惊叹的恒定同质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敏锐的古代哲人所感叹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或许也可以以我们文化的单语特性来解释。我们能够就中西文化的语言背景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然而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上华夏文化是织造在汉语文字上的,但是不管华夏文化今后会拥有什么样的前景,我们的文化再不会也不能只在单一的一种文化语言的背景下发展了。关注世上其他的精英文化语言,和这些语言对话,吸收利用这些文化语言的资源,成了我们的文化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hu Xiaoq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formation.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built on a highly-consolidated monolingualism while Western culture has been developed in a multilingualist environment. In this case, language refers to elite cultural language instead of common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its characters (汉字) and the other languages used in the periphery regions of ancient China was interpreted as a fundamental indicator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arbarian regions, the intellectuals in ancient China traditionally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other languages except the Chinese language, nor did they take any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s part of their cultural cultivation. This constituted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who considered the mastery of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s the content of their basic learning. However, the command of foreign languages has become a trait to distinguish a new-style scholar and a traditional one in modern China, which has in reality caused a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elite cultural language, monolingualism, multilingualism,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arbarian regions (夷夏之别)

(责任编辑　　郑　园)